

# “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 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言论自由观评析

卢家银

## 摘要

伯恩斯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尽管他曾经备受质疑，但是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爱德华·伯恩斯坦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既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在社会之中对于言论自由的争取，宣称言论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权利”，又主张保障党内自由讨论，认为“党内应存在批评的绝对自由”。终其一生，他始终恪守“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的自由理念，并在报刊实践中身体力行。

## 关键词

伯恩斯坦；新闻自由；社会民主；言论自由

## 作者简介

卢家银，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传播法与传媒史论等。电邮：motivewater@163.com

## All Members of Society Have Equal Rights: An Analysis on Eduard Bernstein's Concepts of Freedom of the Speech

LU Jiayin

## Abstract

Eduard Bernstein was the foremost theoretician of revisionism and evolutionary socialism within German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Democracy. Although Bernstein was questioned in a long time, he was the same a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in paying high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freedom of speech. Bernstein not onl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in the society, which the working class fighting for, but also advocated free discussion within the party. Throughout his

life, he adhered to the liberal idea that “all members of society have equal rights” and practiced what he preached in the press.

### Keywords

Eduard Bernstein, freedom of the press, social democracy, freedom of speech

### Author

LU Jiayi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 Email: motivewater@163.com

## 一、前言

爱德华·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 曾是国际共运史上比较有争议的人物,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当时所谓“右派”<sup>1</sup>的主要代表之一(姜德昌,1982:99)。伯恩斯坦22岁就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加入了爱森纳赫派(Eisenachers)。从1881年1月至1890年9月,他连续9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的主编,1891年至1901年期间又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Die Neue Zeit)的常任撰稿人(同时为《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等刊物撰稿)。

在从事这些报刊活动的过程中,他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党内外言论自由问题。伯恩斯坦明确主张言论自由是社会所有成员的平等权利,在社会之内和政党之内均努力保障言论自由。特别是在主持《社会民主党人报》期间,他以实际行动坚定地捍卫了编辑部的独立性。恩格斯给予了伯恩斯坦主办的这份报纸很高的评价,在1890年《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恩格斯称赞该报“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欣慰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传声筒。……‘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恩格斯,1890:89-90)。本文即从社会之中和政党之内两个维度,对其言论自由观念进行介绍与评析。<sup>2</sup>

## 二、社会之中:言论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权利”

在社会之中,伯恩斯坦认为“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主张言论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权利”。

首先,这体现在伯恩斯坦对于社会之中言论自由的公开要求上。1891

年,在他与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共同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将言论自由等权利称为“一切人的平等权利”。当时,他们在《爱尔福特纲领草案》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为新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奋斗,而是为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不分性别和血统的一切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奋斗”,提出了“废除一切限制和压迫自由发表意见以及结社集会权利的法律”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1983:128)。1898年,伯恩施坦在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对此问题做了补充说明,他指出:“民主这一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而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统治在任何具体的场合都将归结于此)就受到这一观念的限制。这一法权观念愈是被采用,愈是支配一般的意识,民主就更加同一切人的尽可能最高程度的自由具有同样的意义。”(伯恩施坦,1898:313-314)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一个民主社会的多数人不会制定持久损害个人自由的法律,因为今天的多数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少数,任何压迫少数的法律都会威胁暂时的多数派本身的成员。……在实践中已经表明,一个现代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存在得愈久,对于少数人的权利的尊重和照顾就愈增加,党派斗争就愈失去憎恨感。”(伯恩施坦,1898:314)

其次,伯恩施坦人人自由的观点体现在其对言论自由重要意义的阐述上。他认为,言论自由不仅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工具和策略,而且是工人阶级理应与其他阶级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他在多个场合表示,一旦社会主义者能够获得这种自由,就既能够对社会改革进行检验,又能够与各类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883年,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社论《社会主义和国家》,认为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他在文中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启蒙教育、不懈的鼓动和组织,为扩大政治权利和改善物质境况而斗争——这些都是我们为达到这一目的加以利用的手段。”(伯恩施坦,1883:37)1884年,伯恩施坦又将他的这种观点做了进一步阐述,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驳斥洛贝尔图斯时称:“政治权利本身当然不能充饥,但是工人阶级越是学会使用这些权利,就越能够迫使统治阶级承认他们的存在,对他们作一些让步,考虑他们的要求……并使统治阶级的死敌越来越强大”(伯恩施坦,1884:77)。后来,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伯恩施坦在1897年

《第二共和国是怎样崩溃的》一书中分析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时指出：“随着出版和集会自由的给予和普选权的宣布，已经在原则上宣告了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伯恩施坦,1897:99）

最后，伯恩施坦的这种言论自由观念还体现在他在无产阶级获取政权后的坚持上。192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执政党、魏玛共和国建立两年之后，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格尔利茨纲领解说》中，仍然坚持其言论自由主张，称“社会民主党决心竭尽全力来保护已经争得的自由。它把民主共和国看成由于历史发展而确定的不可更改的国体，把对这种国体的一切攻击看成践踏人民的生存权利。”（伯恩施坦,1921a:540）与此同时，伯恩施坦还批评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剥夺其他政党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行为。他在《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中称俄国的前述做法“是思想上一个致命的错误的毁灭作用的例子”，他指出：“在俄国，贫困不断增长，对一切政治自由的压制在继续进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报纸得不到发行，资本主义的报纸完全没有，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报刊才能被容许。具有不同思想的人也没有集会自由。自由的经济创造力被扼杀了，而这种创造力对于俄国来说的确需要”（伯恩施坦,1921b:460-461）。

与当时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列宁相比，伯恩施坦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仍主张“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的做法，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向俄国人民许诺了“自由、面包与和平”，称“真正的新闻自由意味着全体公民的所有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Resis,1977）。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却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暂时”和“紧急”措施（例如签署《出版法令》）为由取消了言论与新闻自由，称“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干预都将停止，将在对法庭负责的界限内，按照在这方面最广泛和进步的法律为出版确立完全的自由。”（列宁,1983:619）特别是1918年列宁解散立宪会议引发了冲突和国内白卫军的叛乱等，俄共（布）迅速封闭了其他社会主义党派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调查一切反对言论并予以制裁。俄共（布）“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6月就封闭或因其它原因停刊了470家反对派报纸。包括高尔基主编的、发表过他所写的‘不合时宜的’系列文章的《新生活报》也被查禁”（郑异凡,2008）。在此问题上，伯恩施坦的观点虽然与当时左派代表人物列宁的观点相悖，但是他与当时左派阵营中的另一代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却拥有共识, 并与中派代表考茨基的观点也非常相似。1918年, 针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 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中进行了批评, 她指出: “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 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 广大人民群众的治疗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 强调: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 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罗莎·卢森堡, 1918: 500) 同年, 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批评俄国道: “反对派被剥夺了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在于: 胜利的无产阶级是否需要这些措施, 社会主义是否借助于这些措施才能最好地实现, 或者甚至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实现。”(卡尔·考茨基, 1918: 347) 但是, 令人遗憾的是, 列宁并没有接受伯恩施坦等人的建议和批评, 而是指斥伯恩施坦“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列宁, 1908: 17)。

### 三、政党之内: 所有党员应该有“批评的绝对自由”

在政党之内, 伯恩施坦主张在社会民主党内部要鼓励自由讨论, 容忍不同言论和保障党报编辑部的独立。伯恩施坦的这种党内言论自由观念(当时党内的这种自由主要表现为在报刊上的观点自由交流、批评自由、建议自由等)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机构与党报编辑部的三次争论事件中。

第一次发生在1881年。是年12月, 德意志帝国国会在讨论关于小范围内实施戒严问题时, 有人援引《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言论并加以歪曲, 企图作为戒严的理由。大臣罗伯特·冯·普特卡默(Robert von Puttkamer)提出了社会民主党要为这种言论负责的要求。但是, 两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威廉·布洛斯(Wilhelm Blos)和威廉·哈森克莱维尔(Wilhelm Hasenclever)拒绝了这种要求。尽管不能否认这种做法是这两名议员所采取的斗争策略(为了逃避惩罚), 但是这种做法却意味着从实际上否认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党的机关报, 这又直接违背了维登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此, 该报主编伯恩施坦撰文《非此即彼》, 提出抗议。他在文中称: “如果党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不满意, 党可以把编辑部撤掉, 但是如果听任这样不假思索地否定这个机关报, 这个党的自己创立的机关报, 那就同政治荣誉的最基本概念相抵触了。”(伯恩施



坦,1881:19)《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这种抗议直接招致布洛斯等议员的批评,伯恩施坦在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等人的支持下顶住了来自国会党团的压力,并且针锋相对,论述了党内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远远不是每一行字或者每一篇文章都要求拥有党的权威,但是它可以而且必须要求党为它的一般的原则性立场承担政治责任,不多于此,但也不少于此。”(伯恩施坦,1881:19)在党的国会党团予以妥协、与编辑部达成协议之后,伯恩施坦强调:

所有这一切就是我所要求的和能够明智地要求的,而且也是我只想要的。因为如果党的领导机构进一步承担任何责任,实际的后果就会是限制思想自由,而这种思想自由在我看来是党的机关报的编辑进行有益的工作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伯恩施坦,1928:217)

第二次是1884—1885年发生的航运津贴事件。1884年底,德国首相奥托·俾斯麦(Otto Bismarck)在帝国国会中提出,除过为开辟远东和澳洲两条航线给予私营轮船公司年度津贴,新增一条通往东非的航线。俾斯麦的这个航运津贴提案明显与德国当时的殖民政策与一定联系。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多数派不顾其根本性质,打算投赞成票,认为该法案有可能增加德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对此,伯恩施坦、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等人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进行了批评。并且,从1885年1月22日到3月12日,伯恩施坦又在《读者之声》栏目中陆续刊登巴黎、伦敦、布鲁塞尔以及慕尼黑等地党员的来信,谴责党团(殷叙彝,2007:180)。面对这种强大压力,国会党团在提案表决时一致投了反对票。但是,国会党团却把不满发泄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及其编辑身上。当时的国会党团是德国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具有独立的支配地位(相当于党在合法时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他们成立了一个把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格奥尔格·福尔马尔(Georg Vollmar)排斥在外的委员会(这三人称其为“报刊扼杀委员会”)来调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并通过一项党团声明,声明“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党团进行的批评是‘不能容许的’,并说党的机关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党团采取反对态度,因为党的机关报的立场是由党团负责的。”



（伯恩施坦,1928:226）并且说：“不是由报纸来决定党团的政策，而应由党团来控制报纸的政策。”（Lidtkje,1966:205）国会党团将这一声明寄给了伯恩施坦，并指示将其在下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头条位置发表，却不允许伯恩施坦对该声明表示任何意见。该声明和党团的这一做法使身为主编的伯恩施坦“颇为激动”，在伯恩施坦看来，“这无非意味着要取消我思想上的独立性，而我则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失去这种独立性。”（伯恩施坦,1928:226）于是，伯恩施坦以编辑部的名义给国会党团写了一封信，表示拒绝公布党团的声明，他在信中强调：

《社会民主党人报》并不是党团的机关报，而是党的机关报，只受前者的监督，因此，编辑部采取上述行动就更加是正当的。当然，党的机关报随时可供党团用来对党的问题发表声明，可是，国内的同志们和编辑部若无权利在一件显然有关切身的事情上，必要时也能表示自己对党团的反对立场，则是闻所未闻的……（伯恩施坦,1928:227）

从伯恩施坦的这种论述可以看出，他是把党的机关报看作是全党的机关报，而不是党的领导机构的机关报，不只是党的领导机构（包括党团和执行委员会）可以自由发表观点，而且全体党员也要能够自由发表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他认为，在党内，党的领导机构不能取消党报编辑部的独立性。当时，威廉·李卜克内西前往苏黎世与伯恩施坦就此事进行磋商时，也是由于李卜克内西承认了“应该采用使人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思想独立性不容有任何怀疑的措词”（伯恩施坦,1928:228），双方才建立了谅解的基础。这样，伯恩施坦才接受了李卜克内西拟就的协议通告。而该通告在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就宣称：“国会党团和编辑部一致认为，在党内应存在批评的绝对自由，任何妨碍这种自由的企图将意味着对党的原则的背叛，并将动摇党赖以存在的基础。”（伯恩施坦,1928:229）当时，伯恩施坦还得到了恩格斯、倍倍尔和广大党员的声援和支持。恩格斯在《致爱·伯恩施坦》的信中提出让广大党员运用“党内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对党团的压制行为进行批驳，以捍卫党内的言论自由。他指出：“我从编辑部的角度会给予党团自由，让它在国会里爱怎么



干就怎么干；把它的行动交给党内同志根据惯用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去进行批评。”（恩格斯,1885:309）

第三次是发生在1890年的左倾“青年派”与党内多数派的争论。当时《反社会党人非常法》（Anti-Socialist Law）刚刚到期被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青年派”无视该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的变化，反对进行必要的合法斗争。受到恩格斯谴责的“青年派”<sup>3</sup>，声称在党的报刊上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公开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伯恩施坦援引大会决议和维也纳《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的论述，反驳了“青年派”的无端指责，撰文告诉“青年派”不能将党对党报的监督等同于压制，由此再次阐述了报刊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地位和作用。他写道：“我们希望党的机关报，不只是自称党的机关报，而且真正是党的机关报。是由同志们为同志们写的机关报。正如每一位同志自愿把他的政治活动置于党的监督下一样，如果人们对那些掌握报刊这一重要斗争工具的人提出这种要求，这要求肯定是不过分的。谁要是拒绝这一点，那他就是承认，他把党的机关报同不属于党的目的联系起来了。尽管有监督，观念和性格的独立还是可以实现的。它们并不受外在因素的束缚。”（伯恩施坦,1890:59-60）翌年，他在《新时代》上撰文进一步强调了他的党内言论自由观念，他指出：“纲领有时候作为政治行动的准则是有约束力的，而理论即使在一定的时刻得到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承认，仍旧要不断地受到批判，受到自由的讨论。”（伯恩施坦,1891:13）

#### 四、结语：伯恩施坦的观点与马恩一脉相承

从言论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权利”，到所有党员应该有“批评的绝对自由”，可以看出伯恩施坦的言论自由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是一脉相承的。

在社会之中，马克思也始终是将言论自由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来争取的。他称言论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是“普遍的权利”和“普遍自由”，而不是“个别人物的特权”（马克思,1842:167）。马克思（1842:201）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论述了言论与新闻自由的重要意义：“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





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恩格斯不仅高度认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将言论自由等表述为“一切人的平等权利”的提法,而且还将言论与新闻自由称为公民的“第一个权利”(恩格斯,1844:575)。1844年,他在《英国宪法》一文中指出:“每个人都可以不受阻挠地和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而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就是新闻出版自由。”(恩格斯,1844:575)

在政党之内,恩格斯除了在航运津贴事件等事件中,直接支持伯恩斯坦捍卫党内言论自由,还在多种场合下阐述了伯恩斯坦几乎完全一致的党内言论自由观点(马克思在世时,尚无工人政党出现,所以他没有关于党内言论自由的论述)。1889年,当得知丹麦社会民主党将党内的反对派开除出党之时,恩格斯(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并不赞同丹麦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的观点)坚决反对丹麦社会民主党这样处理争议,在《致格尔桑·特利尔》的信中,恩格斯(1889:324)指出:“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伯恩斯坦当过恩格斯的文书(约翰·麦克里兰,2003:630),是恩格斯的“学生”,在他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期间和之后,与恩格斯交流频繁,受到恩格斯的较大影响,并且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之一(戴维·麦克莱伦,2008:22)。毋庸置疑,伯恩斯坦的言论自由观念必然受到恩格斯较多影响、且深受恩格斯认可。并且,即使是在第二国际内部受到“接二连三的最凶狠的攻击”,包括各类批判、指责和人身攻击,“伯恩斯坦也没有低下他的头”,他仍然坚持辩论,继续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更没有要求限制或取消党内的言论自由(伯恩斯坦,1962:32)。由此来看,我们就不能随意将伯恩斯坦算作是背离马恩和无产阶级。

(责任编辑:陈曦)

### 注释 [Notes]

1. 姜德昌等人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将伯恩斯坦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派首领,修正主义的鼻祖”。



2. 本文所称的言论自由并不是狭义上说话的自由,而是广义范畴的言论自由。它是指社会民众按照自己意愿通过各类传播媒介搜集、传播信息和发表意见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说话、演讲、著作、出版和艺术表达等自由。在19世纪的德国,爱德华·伯恩斯坦等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所提到的言论自由,也主要是指在各类宣传册、报纸、杂志、会议与集会上发表观点、交流意见和进行讨论的自由。所以,本文在论述上坚持尊重历史的原则,采用通用的“言论自由”的称谓,对于所涉及文献中出现的报刊自由、印刷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等表述均保持原貌。
3. “青年派”是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一个半无政府主义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由一批青年作家和大学生组成。他们不顾“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的变化,反对党利用合法地位开展合法斗争,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讲坛,仍然要搞冒险活动。恩格斯当时把“青年派”称为玩弄“空谈革命”的英雄,批评这些人企图“通过内讧和阴谋来瓦解党”。

###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伯恩斯坦 (1881). 非此即彼. 载殷叙彝 (编),《伯恩斯坦读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Bernstein (1881). One or the Other. In Yin Xuyi, *Collected Works of Bernstei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8]

伯恩斯坦 (1883). 社会主义和国家. 载殷叙彝 (编),《伯恩斯坦读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Bernstein (1883). Socialism and Country. In Yin Xuyi, *Collected Works of Bernstei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8]

伯恩斯坦 (1884). 面包与自由. 载殷叙彝 (编),《伯恩斯坦读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Bernstein (1884). Bread and Liberty. In Yin Xuyi, *Collected Works of Bernstei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8]

伯恩斯坦 (1890). 关于党内问题. 载殷叙彝 (编),《伯恩斯坦读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Bernstein (1890). Problems within the Party. In Yin Xuyi, *Collected Works of Bernstei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8]

伯恩斯坦 (1891). 自我广告. 载中央编译局资料室 (编),《伯恩斯坦言论》. 北京: 三联书店, 1966

[Bernstein (1891). Self-advertising. 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Remarks of Bernstei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伯恩斯坦 (1897). 第二共和国是怎样崩溃的. 载殷叙彝 (编),《伯恩斯坦读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 [Bernstein (1897). How did the Second Republic Collapse? In Yin Xuyi, *Collected Works of Bernstei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8]
- 伯恩斯坦 (1898).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载殷叙彝 (编), 《伯恩斯坦读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 [Bernstein (1898). 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 and the Mission of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In Yin Xuyi, *Collected Works of Bernstei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8]
- 伯恩斯坦 (1921a). 德国社会民主党格利茨纲领解说. 载殷叙彝 (编), 《伯恩斯坦读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 [Bernstein (1921a). Commentary on the Görlitz Programme of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In Yin Xuyi, *Collected Works of Bernstei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8]
- 伯恩斯坦 (1921b). 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载中央编译局资料室 (编), 《伯恩斯坦言论》. 北京: 三联书店, 1966
- [Bernstein (1921b). Self-advertising.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Socialism, Remarks of Bernstei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 伯恩斯坦 (1928). 社会民主党内的学习年代 (摘录) (李进军、曹伯隽等译). 载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 (编),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六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Bernstein (1928). Sozialdemokratische Lehrjahre. 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Research Data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Vol.6)*.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
- 伯恩斯坦 (1962).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史集译). 北京: 三联书店.
- [Bernstein (1962). *My Years of Exile: Reminiscences of a Socialist*.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戴维·麦克莱伦 (2008).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McLellan, D. (2008). *Marxism after Marx*.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恩格斯 (1844). 英国状况英国宪法.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Engels (1844). Status of Britain and British Constitution. 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恩格斯 (1885).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6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Engels (1885). To Eduard Bernstein. 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36)*.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4]
- 恩格斯 (1889). 致格爾桑·特利爾. 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Engels (1889). To Gerson Trier. 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37)*.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1]
- 恩格斯 (1890). 給“社會民主黨人報”讀者的告別信. 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 [Engels (1890). Farewell Letter to the Readers of the Sozialdemokrat. 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2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5]
- 姜德昌(編) (1982). 《世界近代史人物傳 (下冊)》.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 [Jiang, Dechang (ed.)(1982). *Biographies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Vol.2)*.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卡爾·考茨基 (1918). 無產階級專政. 載王學東 (編), 《考茨基文選》.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Kautsky, K. (1918).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n Wang Xuedong,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Kautsk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列寧 (1908). 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 載《列寧全集 (第1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Lenin (1908). Marxism and Revisionism. 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Collected Works of Lenin (Vol.17)*.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 列寧 (1983). 《列寧論報刊與新聞寫作》(楊春華, 星華譯). 北京: 新華出版社.
- [Lenin (1983). *Lenin's Opinion on the Press and Newswriting*.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 羅莎·盧森堡 (1918). 論俄國革命. 載中央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 (編), 《盧森堡文選 (下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Luxembourg, R. (1918).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Collected Works of Luxembourg (Vol.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0]
- 馬克思 (1842). 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 (第一篇論文). 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Marx (1842).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Rhine Province Assembly (First Article).



- 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 殷叙彝 (2007). 《民主社会主义论》.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Yin, Xuyi (2007). *Democratic Socialism*.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 约翰·麦克里兰 (2003). 《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 [McClelland, J. S. (2003). *A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Ideas*. Haikou: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 郑异凡 (2008). 自由——十月革命的第四个口号. 《探索与争鸣》, 1, 62-65.
- [Zhen, Yifan (2008). Liberty: the Forth Slogan Put forward by Russian October Revolution.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162-65.]
-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 (1983).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 (第二卷)》.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Scientific Socialism Department of RUC(ed.)(1983). *Selected Work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Movement (Vol.2)*.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Lidtke, V. (1966). *The outlawed party: social democracy in Germany, 1878-189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esis, A. (1977). Leni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Russian Review*, 36 (3), 274-296.

